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概念

郭振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程度, 是指国与国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影响所呈现出来的无序水平。以符合各个历史时代的具体的无政府状态程度分析国际体系, 会清晰地看到无政府状态并非一成不变, 因此单一划分的无政府状态是没有意义的。地域性、历史性、互动性是与无政府状态“程度”相关的三个特性。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必将把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而进一步削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程度, 进而对人类的和平稳定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国际无政府状态; 程度; 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2-0009-05

“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早在1948年, 汉斯·J·摩根索在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中就强调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随后至今, 不论是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派, 还是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 虽对各自理论的前提假设几经扬弃, 但“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地位却从未动摇。甚至, 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也并不是为现实主义所特有。^{[1](P.5)}然而, 无政府状态是否是一种永久性的状态? 在世界政府(假设未来有的话)出现之前的无政府状态程度是否是一成不变的? 本文围绕“程度”概念, 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际无政府状态理论

1948年, 摩根索在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中提到, 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 而

主权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机构。在国际社会, 不存在一个制定法律和强制实施法律的中央权力机构,^{[2](P.347)}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属性, 决定了国家是利己而不是利他的,^{[3](P.229-252)}即每个国家都只能寻求自助。寻求自助的目标, 或是追求权力, 或是追求安全, 依此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中, 又逐渐形成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先验而又不变的结构因素。按照沃尔兹自己的概括, 结构现实主义有以下几个要点: 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 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 各单位实力对比变化引起结构变化进而引起国际体系的变化; 国家间竞争与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生活的两个彼此相联的现实, 即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 与此相联的是对国家现实的或可能的威胁随

处可见；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的一再爆发；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形式经久而未变等。^{[4](P.3-5)}

那么，无政府状态是否是一种单一的静止的状态呢？各个历史时期的无政府状态有何不同呢？现实主义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例如，沃尔兹曾在《国际政治理论》第六章中，深入分析了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但他的分析目的也仅限于对政治秩序进行划分而已。反而是建构主义学派的亚历山大·温特对此做出了分析，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状态。温特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温特提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即以相互敌视、相互残杀为特征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国家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如果国家间关系的目的是摧毁和吞并对方，国家间的行为特征是各方力图改变现状，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导致霍布斯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中，国家不再相互视为仇敌，不再以消灭敌人作为基本目的，它们承认相互的生存权利和财产权利，典型的标志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主权的确认。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利益冲突会使国家使用武力，但是，征服他国和侵占他国领土已经不是主要目的，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维持现状。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之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这实际上是安全共同体的形式，这种文化体系的显著特征是非暴力和互助。至于哪一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则要看作作为施动者的国家怎样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文化建构了。这就是温特著名的论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5](P.26-27)}

然而，国际环境中，无政府状态更多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并不是单个国家通过有意的“实践活动”就可以达到预期的“无政府状

态”的建构。尽管温特已经提出了国家互动对结构体系的影响，但如何互动，以及对当前的无政府状态影响程度如何，最终对无政府状态的发展趋势影响如何，温特并没有更详细地回答。

从以上分析可知“国际无政府状态”概念的产生是与国内主权政府以及等级管理体系相对比得出的，暂不论这种类比自身的局限性，^{[6](P.35-60)}单就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社会的动态关系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的学者，就有不同的解读。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无政府状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二、国际无政府状态“程度”概念

无政府状态的核心逻辑是：无中央权威国家自助。与国内主权政府以及等级管理体系相比，由于没有“世界政府”，因此可以说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尤其从全球角度）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传统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这样的分析，显然又太过于宏观和静态了。宏观意味着对一些局部的与自助逻辑矛盾的行为（例如国家间的合作甚至有纯粹利他行为）的故意模糊淡化，静态则意味着认同人类历史中从古到今、从今天到未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终极性。这种以无政府状态包罗一切国际关系现象的绝对分析恰恰忽视了国际现象的动态发展对无政府状态的再塑作用。

实际上，国际体系中，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制定法律和强制实施法律的中央权力机构）相对应，还可以有其他角度的分析。比如，从局部角度（微观层次）来看，局部国家通过软硬实力对周边地区的有效塑造和规范辐射，会改变原先相邻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从动态角度（历史分析）来看，不同国家间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用不同的无政府状态去分析。

因此，笔者提出无政府状态“程度”的概念，以细化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所谓国际无政

府状态“程度”，是指国与国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影响所呈现出来的无序水平，尤其表现在安全领域。当今社会，固然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实力与秩序，还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服从与配合），却也不存在国与国之间完全的相互脱离（既没有任何国际制度、相互条约的约束，又没有影响他国的真正任何有效手段）。现实的国际社会，这两种极端情况并不存在，而国与国之间（或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相互无政府状态总在一系列“程度”序列的某个点上，即表现出一定的“政府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点”也必然在不断运动着。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的数量众多，因此，单一划分的无政府状态是没有意义的。

三、无政府状态“程度”相关的三个特性

1、无政府状态的地域性

笔者反对将全球作为分析无政府状态的着眼点。因为“全球”的宏观分析，往往不能反映区域内国与国之间交往状态的演变。例如，世界范围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今日相比，“无政府状态”虽依旧存在，但世界各国（尤其是日益壮大的欧盟的内部各国）的交往状态，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各个区域组织的兴起发展，以及对区域内各国的影响限制，也已不能用单单一个“无政府状态”来细化解释。

区域组织不仅使得主权国家让渡一部分主权并最终让该组织共管（例如，安全条约体系对于领空的共同防御），而且使得两国（或多国）的行为更多指向第三方。因此，无政府状态的“程度”也呈现了减弱的特征。

2、无政府状态的历史性

不同国家间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然要用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程度”去分析。正如温特所分析，“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即以相互敌视、相互残杀为特征的

无政府状态，这是国家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或许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的西方世界是这样一种状态。^{[5](P.26-27)}甚至，笔者认为19世纪中后期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也是真实存在的，两次惨痛的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幸运的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两极格局到今天的一超多强，从主权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到今天的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跨国集团日渐兴起，不仅无政府状态“程度”呈现出减弱趋势，而且无政府状态的形式在发生质的飞跃。

3、无政府状态的互动性

无政府状态作为一种国际结构特征，从其概念可知，是指主权国家之上无最高权威管理，而不是指（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个人之上的无政府管理，所以，国家（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是导致无政府状态“程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国家（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向良性或恶性方向发展，也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向更有序或更无序方向发展，还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向程度加深或程度减弱方向发展。欧盟内部无政府状态程度减弱就是各国积极互动的结果。从成立至今，各国的经济联系（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而政治、外交领域的相互协同性大大加强，更重要的是，各国国民心理上的欧洲认同感大大加深，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强欧盟的“政府性”，减弱欧盟各国之间的“无政府性”。

四、当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程度”减弱的原因

毋庸讳言，今天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联合国虽然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但是这个组织主要仍是一个会议场所，即使许多国家参与达成的共识和宣言最终仍需要各个国家自觉去执行，缺乏强制约束力。一些国家对于联合国的态度，不仅可以拒交会费

要挟，还可以撕毁条约，甚至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行动。然而，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世界整体无政府状态程度是在不断减弱的（当然有局部例外）。归纳其原因，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国际体系行为体在变化

当今世界已经不是一切国际事务都由主权国家政府来主导。尽管主权国家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这类行为体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还有各种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国际政治运动、种族集团、宗教组织、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甚至包括个人。^{[7](P.103)}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跃度在不断增加，甚至起着国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2003年，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先发制人打了伊拉克，但随后对伊的战后重建与治理，却离不开联合国的参与；冷战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通过资本渗透，技术支持，对小国的内政外交实行干预，以及这几年规模日渐扩大的世界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援助，都可见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活跃参与。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样化，反映了国际利益内涵和外延的多样化。各种行为体的互动结果，必然减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程度。

2、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在加深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自立于世界体系之外，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只凭一己之力获得快速稳定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日渐全球化。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如何在日渐激烈的竞争中获取较高的收益呢？不同形式的合作成了唯一途径。而合作就意味着相互的义务在增多，相互的依赖在增多。合作不同于自助。自助是出于对国际体系状态的极度不信任和未来走势判断的极度不确定，而合作是在相互信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信任）和对合作前景乐观预期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说，各国之间“相互合作-程度加深-相互依

赖”这样的运行模式也减弱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程度。

3、国际观念建构在发生变化

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所提到的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是所谓的“丛林时代”（从人类开始形成群体并产生了群体的纷争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这个时代，特别是它的初期，是一个彻底的弱肉强食时代，人类社会中的独立政治个体迅速削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第二个时代：“后丛林时代”。这个时代，大多数国家开始逐渐尊重各自的生存权，国家之间的政治不再是“你死我活”意义上的争斗，而变成了“好活还是歹活”意义上的较量。国家的终极追求也从“以扩张求生存”逐渐变成了“先保障生存，有机会再扩张”，或者“不扩张，但好好生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特别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以及二战之后，人类开始建立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这些组织和规则不同于军事同盟的条约），试图约束国家间的暴力行为。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用国际组织和规则来调节国家之间的政治。^{[8](P.144-145)}

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必然是人类对国家、国际社会、制度规则的认知观念不断建构的历史。这种认知建构本身就是逐步降低无政府状态程度的过程。温特甚至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自助是一种制度，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存在的许多认同与利益结构之一……从自我与他人之间在认知上相一致的程度和方式来说，安全的概念存在差别。无政府状态与实力分配的意义正是依赖于这种认知的转变。^{[9](P.149)}各国之间对国际制度、规则和国际规范的态度，从观念的建构到合作实践，也必将减弱无政府状态程度。

五、结论

国际政治理论是具有时代性的。国际政治理

论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提炼而来的，因此，这种理论的产生脱离不了对历史的理解、抽象归纳、形成假说，然后经过历史的印证和未来的检验最终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理论一定是“历史”的。^{[8][P.144]}

当我们以符合各个历史时代的具体的无政府状态程度去分析国际体系时，才会更清晰地看到无政府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冷战已经结束

20年的今天，无政府状态程度正发生着令人欣慰的减弱变化。讨论“世界政府是否会产生何时到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一味地宣传“无政府状态是自然状态只好寻求自助”更是消极看待国际社会的未来。世界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把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程度也必将进一步削弱。

[参考文献]

- [1] Jeffrey W. Legro,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9 (2).
- [2] [美]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 [M]. 徐昕.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 [3]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5 (2).
- [4] [美] 肯尼思·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 [M]. 胡少华.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 [5] [美] 亚力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M]. 秦亚青.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6] Herbert Butterfield, Martin Wight.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 [7]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8] 唐世平. 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 [9] [美] 亚力山大·温特. 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 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 [M]. 秦治来.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齐琳)

· 学术信息 ·

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转向”

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8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一文中，作者朱立群、聂文娟认为，在20世纪“社会学转向”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在又出现了“实践转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这种“实践转向”，是指国际关系研究从对权力、利益、身份、语言的研究转向实践。与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学转向”相比，实践理论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看成是实践，而不是其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践理论从实证主义转向了实用主义和溯因推理。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研究旨趣在于推动对日常实践的关注，研究议程包括对于施动者和结构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于社会因素生成和体系转换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车力)